

作家访谈

这一次我要写一部陆天明式的小说。我的初衷首先一定要真实,我要写我经历过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真实,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调子走。

我要写一部陆天明式的小说

——访作家陆天明

他写出了中国一代理想主义者活着的愿望。他们守望理想,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追求无私和高尚的精神生活,寻找人生大门的钥匙。陆天明,这位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在新作《幸存者》中表现出既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留给我时间不多了,我要写一部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我要用我的笔和我的作品,投身这个巨大的变革,和所有读者、所有父老乡亲一起思考中国往哪里去,这是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回避的。”言语间有些悲壮,但正因为这种紧迫感,陆天明的这次写作犹如“刀尖上跳舞”。

《幸存者》所讲述的是热血青年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一代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承上启下,他们经受过磨难,了解中国实情,懂得珍惜与回报,也有追求的魄力与方向感。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精英,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参与者。陆天明将视角对准这一代人,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这一代人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成功地书写了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备忘录。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陆天明在保持理想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全景式展现了一代人的经历。他说:“我可以想象到,今后‘中国三部曲·骄阳’完整出版之后是具有史诗品格的。”

为描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艰难王成的历程,陆天明计划以“中国三部曲·骄阳”三部曲的形式,展现几代人在翻天覆地的岁月里所经历的重大转折。因为主题鲜明、题材恢弘,该“三部曲”被列为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是其中唯一的一部文艺类图书。

中华读书报: 小说叙事非常有耐心,富有节奏感,句子中出现黑体,有些特别加括号注释。这在您先前的创作中是没有过的。

陆天明: 我有一个重要的初衷,就是提供思想资源。以前的小说情节性更强、更大众化一些,这一次全方位、全景式地呈现一代人,就要做一些心理的、思想的剖析,这一部分怎么做得恰当、深刻,又不过分,是我

这一次的创作使命。

小说中某一部分文字能不能用黑体字开始是有争议的。我坚持用黑体字,因为这是我要读者特别关注的部分。包括句法的使用、长句切断,不是优雅、完美的规范的,有一种撞击的节奏,这也是我写作心情和写作初衷的体现。

中华读书报: 很多作家写“过去时”,都以一种包容平和的姿态。但是《幸存者》的阅读却使我感受到一种激情。

陆天明: 天性使然。我所有的作品都有这种特点,这和我文学理念有关。我要参与,我不是旁观者,对社会的变故、命运的沉浮,我要喊出我的想法。所以从小说结构、组织篇章、语言的运用、标点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我要表达,希望能直击读者心灵,而不只是冷靜的表达。

也和创作主题和初衷有关。我从14岁就当知青,1958年到安徽,1964年又到新疆,都是热血沸腾,不是像有些人断定的那样是被裹挟被动的。当时确实有一群年轻人,当然包括我非常向往这种革命的道路,彻底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我特别关注后来几千万知青的人生道路,表现在小说上,我就要说出我们这些代人最关注的是什么,最值得留下的是什么,他们遭遇中的什么是被人遗忘的,什么已经被遗忘但不该被遗忘。所有这些对形成国家的面貌和中国将来的建设,是不可或缺。这也是我之所以要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的根本原因。我无法平静。

另外和前些年文学圈的分歧也有关。前些年文学圈一些朋友不太主张作家关注社会,更提倡关注自我。我的文学主张就是要介入,介入社会变革。世界上很多大家也是做纯文学的,但他们都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非常社会又非常自我,把两者结合得很好。他们的作品在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是我特别钦慕的。从本质来说作家的自我和社会不能脱离。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是人民的镜子,是人民呼声的传声筒。我希望《幸存者》能做成这样一部作品,

完成我的文学理想。

中华读书报: 您早期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是文革开始较早的知青题材,后来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被国外研究知青文学的专家评价为是“中国知青文学的第四块里程碑式作品”,描写了知青理想的破灭,很尖锐。《幸存者》中也描写了知青生活——和多年前的写作相比,肯定有所不同吧?

陆天明: 我认为是有进步了。《扬帆万里》完全是正面肯定,《幸存者》中的知青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想法去边疆。抱着初心去了,去了以后怎样,《扬帆万里》没有深刻展开,《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知青到农村后被异化,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回避的重大主题。《幸存者》仍延续这个主题。知青进入边疆一定会有变化,会逐渐成熟,但是也有是一样的,就是不忘初心。怎么表现这种“不变”?进入复杂的现实社会,没有实现理想,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活下去?理由是什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自问。知青的处境更困难,更复杂,带来的人生反问,反思更典型。“幸存者”写到的那群青年典型觉得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作用。这也是我写《幸存者》的重要原因。这不是几个知青在中国社会的故事,不是简单的上山下乡。而是反映更广阔的几十年来时代历史变迁。

中华读书报: 《幸存者》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脉络。尽管之前的作品有所涉及,但对您来说依然是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

陆天明: 青春岁月是成长的起点,对人生和事业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知青生活,对我们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是进行崇高的精神升华,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投入到边疆农村,无论是被动的裹挟的,还是主动投身,都是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改造中国,为了崇高的事业,飞蛾扑火般经受过一段人生最艰难的历程。回过头去认识,我觉得非常自豪。直到现在老知青还经常回去聚会,并不是一般的怀旧,到曾经度过青春年少的地方去消闲,而是一种对当时无论潜意识还是有意识、无论

显性还是隐性的崇高理想的回顾。从人心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当时的作为无论多么极端、偏激,生命的内核是追求崇高和无私,总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回顾。

对我来说,作家总是写感受最深的东西。我写真正的知青题材有两部,《扬帆万里》是完全正面的写奉献,有片面的地方,我仍然认为,作品的内核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是提倡年轻人如何对祖国、对社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提倡这种精神。

中华读书报: 在如何把握重大题材上,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陆天明: 这一次我要写一部陆天明式的小说。不看任何人眼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这次写作很艰难。原来以为半年能写完。但是写了两三个月,磨来磨去,写了三百多万字,翻来覆去写,感觉不准确,重写一遍、再写一遍。可以这么说,全书的这一段都反复写过好几遍,要唤起当年的生活感觉和生活细节。我的初衷首先一定要真实,我要写我经历过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真实,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调子走;第二,要避免我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的片面和偏激,站在未来的角度,纠正我们这一代人的片面,也就是要准确的表达,以正确的判断写出来。写作《幸存者》有两个身份:一是当年的我,二是站在正确客观的角度呈现的我。

中华读书报: 如何处理这种“艰难”?

陆天明: 如果回避“真实”和“正确”,会写得很轻松。但这不是我该做的,我没有回避。许多事情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能讲了,怎么讲好,不能逞一时之痛快,不能只为自己说话,要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尽可能地讲好,并要诗意地铺展。

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我自信我说的这些对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我坚信会得到理解。中国文学向高峰迈进,不在高原上徜徉,一定要真实面对历史和真实地展开当代,否则就不会有文学最好的东西:纯真。文学有真文学和伪文学。寻找轻

松、迎合的路子走,不是真文学。要做真文学,标准就是真实面对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要有勇气把人民经历的、向往的一切呈现在文学中间。这是当代作家要完成的使命。很多作家做到了,我以前也做了一些,这次我希望在文学和使命结合上做得更好一点,贴近真文学。

中华读书报: 您是一个特别注重深入生活实地采访的作家,这次写作是调动了记忆还是像小说中李爽那样,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复制的大时代苦难而又辉煌的篇章”而有意留下了相关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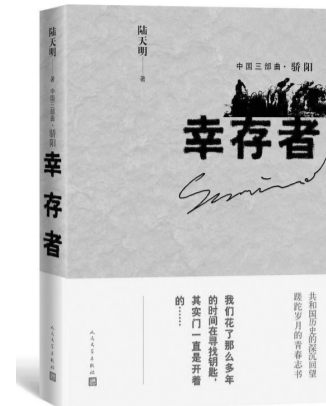
陆天明: 由于处于惊涛骇浪的时代,我没有刻意留下文字记录。但大的感觉一定是存在记忆库里的。怎么判断怎么看待,要呈现哪些基本感觉,也是从记忆库里提炼出来的。小说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基本情节细节都是真实的。它们发生时,或者我在场,或者我的战友朋友们在场,或者干脆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特别要声明的是,写这部小说,也像我写其它九部小说时一样,事先不做提纲。大的框框和走向确定之后,就放马江湖,跟着感觉走。很多段落的细节是写着写着往外蹦出来的。

这样完全感性的、迸发式的写作,就使记忆库里最生动的细节冒出来了。钟绍灵结尾自杀的场面就是写作中自己迸出来的。经验告诉我,一旦人物成形了,让人物带着我向前走,说他们想说的话,做他们该做的事,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生动鲜活的,也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我追求的创作状态和境界。

中华读书报: 故事的讲述有穿插,有议论,在叙述方式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陆天明: 议论是小说所允许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也有大段议论,喜欢跳出来讲话,但要合理、精辟、不累赘,这种做法会提升小说的含金量。缺乏思想性是许多当代小说明显苍白的根源之一,我认为文学还是要给读者提供指向性和思想性的东西。

多少伟大的作家都写伟大民族的变革。比如我们学习马尔克斯,关



“中国三部曲·骄阳”之第一部《幸存者》,陆天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42.00元

注拉美文学,只注意到了他们的魔幻手法和文本探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这样的本质。而我们处于巨变的年代,更应该把这种百年不遇的宏大巨变的种种多面体进行文学的呈现。

中华读书报: 小说中出现“群体飘移和个体化现象”,是一篇真实存在过的论文?

陆天明: 你注意到了这个命题,让我特别高兴。这个命题不是现实中有过的什么论文题目,这是我对生活的总结和提炼,也是我很得意的一笔。改革开放后党内一批人失去了精神支柱,不再强调理想主义。腐败程度之严重令人发指,出现了经济和社会道德的飘移,怎么看这批人的变化?为什么发生了群体飘移?是因为发生了个体化;个体化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出现了群体飘移。只不过它在小说中借口一位在基层生活多年的老同志做出这样的概括。

中华读书报: 小说中出现很多经典著作,既有出自著名小说《牛虻》“如果我必须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也有库塞尼《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列宁《国家与革命》……这些内容在小说中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陆天明: 所有这些引用的著作都是我看过的。当年我因病回上海休养,每天就泡在上海市图书馆。这些书在小说中一方面是思想资源,一方面构成了小说的骨架。一部艺术作品,必须要有思想资源,否则不是很结实。创作《幸存者》时我重新阅读了这些著作,思考提取了很多东西,在小说里得当的地方,把这些大哲学家精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筋骨。当然,我写得很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好,争取做到让读者拿起来放不下。

(鲁大智)

在自然中漫步,才能散发出诗人的思绪,自由的联想,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复苏自然的人性,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位诗人的山间旅程

2010年夏天,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打算徒步穿越自己家乡的奔宁山脉。奔宁山脉是英格兰北部主要山脉,有“英格兰的脊梁”之称,山顶上256公里的奔宁山道从德比郡的埃代尔到苏格兰的阿克耶特姆,贯穿了约克郡、诺桑比亚郡,一直延伸至苏格兰境内,西蒙的故乡马斯登位于山道南端。奔宁山道是英国第一条官方长距离远足道,1965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一般徒步者都从南往北走,可诗人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长路的山道分为20段,事先计划好每天行程,在网上发布旅程计划邀请民众给他提供免费食宿,安排好落脚点。作为一位现代行吟诗人,他会在每天途经的落脚点进行诗歌诵读,用诗歌换取盘缠。《流浪到故乡》就是诗人奔宁山道行旅真实而生动的记述。

彼时西蒙已经47岁,相对强壮健康,但他的腰部有毛病,又有遗传的小肺活量。虽然是地理系毕业,但对奔宁山道地形地貌并不熟悉,之前也未有过长距离徒步的经验,大家都觉得他对自己过于乐观,毕竟奔宁山道历来以难走出名,每年有数千人次致勃勃地出发点出发,最后完成全途的寥寥无几。家人对他的这次徒步旅行不甚乐观,妻子认为他是中年危机,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耗时三个星期不间断的白天行走晚上朗诵来证明自己已然成熟,为什么不能跟别人一样买架哈雷摩托车或者梳个马尾辫就能了事,何苦去吃那些没必要的苦头?但对西蒙来说,行走奔宁山道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挑战,更是精神上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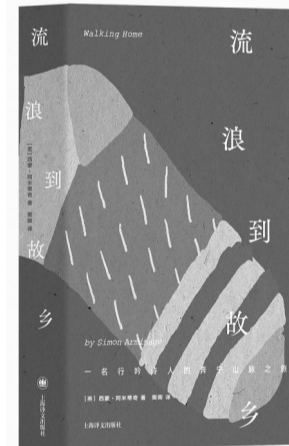
西蒙没有理会家人朋友的疑虑。与其坐在家里担心这担心那,不如推开门,出发。走在路上,才能够真正面对困难,解决问题。西蒙徒步奔宁山道有时有朋友陪伴,有时有家人同行,也有不认识的网络友好陪他走一段,大家一起翻山越岭,但很多时候只有他自己,偶尔

还有路边的一条狗。有些路段如哈德良长城很著名,游人众多,有些山路远在深山,渺无人烟;有时候山路很好走,风光旖旎,有时候大雨滂沱,泥泞难走,无处避身,有时候山雾迷茫,看不见来路望不见回程,迷失方向。他会遗失宝贵的登山杖,也会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每天晚上他在陌生人家中投宿,接受陌生人的热心安排,晚上他在事先安排好的朗诵会上朗诵诗歌,结束时用袜子接受听众的打赏。20天的行程,他一共给1158个听众朗诵了诗歌,共收入3086英镑。

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说:“我从来没有像在独自徒步旅行中

那样充分思想、充分存在、充分生活、充分体现自我。我静止不动时几乎不能思考。”在自然中漫步,才能散发出诗人的思绪,自由的联想,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复苏自然的人性,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诗人以敏锐的观察力记录了旅程中所思所想,字里行间的自嘲增加了本书的幽默感。在距离完成全程只有容易的几步路程时,诗人选择转身离开,没有完成全程,因为冲过终点,完成使命,荣归故里并非他的目的。在雨里诅咒,在浓雾里迷失,在骄阳下暴晒,在森林中迷路,在沼泽里挣扎,在空无一人的山野里叹息,在陡峭的山峰上彷徨,经过尴

林微云



《流浪到故乡:一名行吟诗人的奔宁山脉之旅》,[英]西蒙·阿米蒂奇著,樊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48.00元

尬、害怕、裸露、孤独和疲倦,浑身疲惫臭气熏天,最终坚硬的山道磨练了他的脚板,也磨砺了他的意志。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母亲生了我,另一次是遇见你”。真正的救死扶伤,在此早已不止于行为,而是生命之间超越言语的心灵呼应。

生命之间的心灵呼应

东京的上野公园里,竖立着一座艺术罗丹根据但丁《神曲》所创作、费时三十七年才完成的雕塑作品“地狱之门”。在这件既表现地狱入口同时也象征着地狱意象的作品上,有一百多个形态各异扭曲痛苦的人体。“地狱之门”的上方写道——“凡到此处,放弃一切希望”——这是何等严酷的语句!然而,这么个作品,在上野公园里面,却并不显得煞风景。相反,它深受人们喜爱,这是什么原因呢?

近年来笔耕不辍的张丹,先是编辑了八十多位作家的动物散文而成《动物记》,又写下以身边的猫儿为主角的故事集《那些刻在我们心上的爪印》,还经常透过网络发表动物保护的相关文章。近期的新书《另一次是遇见你》,收录了她身为作家、猫奴、活跃的动物人的行动纪实、人物访问或侧写,还有对社会、文化、历史的反思。如书封所言,这是一本关于

“动保/素食/生命”的书。

张丹选择将动物和人们致力于保护动物的故事,写成一篇篇的文字,其远远不是简单的记事或散文,而是作者十多年以来以亲身的深度参与所换取的心路感受。除此之外,她还采访了来自美国、却在中国全职投入流浪动物救助的“洋雷锋”,以及成立黑熊避难所、致力于终结“活熊取胆(汁)”的公益领袖。这些文字建立在作者和受访者一同做“动保”的深厚友谊、理解和信任之上,因而细腻深刻。

透过发掘种种动物虐待问题,作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性剥削动物的事实。吾辈所习以为常的吃肉、逛动物园看表演,以动物入药等行为,竟来自于有违伦理及天理的产业链。若是首次接触这些生灵涂炭的人间故事,读者可能会感到些许意外。然而,本书最吸引人的,却是作者然而一切地投入动物救助及保护

时,那种全然忘我的生命境界,这也正是张丹的文字最为可贵的感召力。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保护动物是浅薄而“爱心泛滥”的暇余生活,或许也有人觉得,“救猫救狗”的新闻屡见不鲜,何必投入更多的资源以保护动物?

米兰·昆德拉曾写道,“人类真正的善只有对那些没有任何力量的人……真正的道德试验是人与那些任人支配之物(也就是动物),两者之间的关系”。昆德拉的话与哲学家马克·罗兰兹的观点极为相似,后者认为,只有面对真正的“弱者”时,我们完全不期待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的好处,此时,我们的行为才有道德可言。动物,作为一种有感知而沉默的大群体,是当下社会中的绝对弱势。更进一步来说,透过张丹这本书,读者将在很多不同的社会压迫形式中,看到多种公共议题和物种歧视(speciesism)

之间的共构性。

动物保护,不因为社会的经济条件而决定其进步性,更在于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及其深根的文化养育。当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时,往往能发现他重要的特质。张丹透过文字而自然流露出的,正是对生灵受难的不舍和怜悯,以及由此生发的道德行动力,令人敬佩。一如书中收录的写给动物保人的小诗(作者是集合了雷锋、白求恩、安吉·阿德等人物形象于一身的动保人Chris Bar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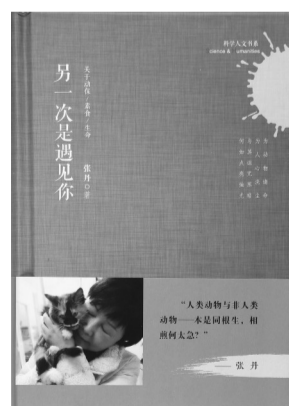
“我们的任务不是为它们难过,更不是为它们而哭。/当别人说他们没有话语权,我们会替他们说话。/我们不为它们掉眼泪,不为它们绝望。/我们的任务是让它们行动。/我们的任务是让它们创造希望。”(节录)

在张丹眼里,不仅动物因为得到

救助而有了“第二次生命”,付出行动的人,同样在此过程中得到拯救。本书书名源自一句名言:“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母亲生了我,另一次是遇见你”。真正的救死扶伤,在此早已不止于行为,而是生命之间超越言语的心灵呼应,才能带来生存的希望。

张丹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动物,还包括所有因为同理心及正义感而行动的人们。她译介的“同情心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论文,以自身和同行者的体验为本,希望为可持续的社会工作立下基石,更试图传达一种团结的利他精神。读者如我,感激这种精神的存在,它使人们在行动之中彼此支持,共同对抗那些弱者所正经历——而我们感同身受的生命的苦。

阅读这本书时,笔者总是想起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地狱之门”。人们不喜欢这个作品,应该并非是对痛苦的



《另一次是遇见你——关于动保/素食/生命》,张丹著,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30.00元

沉溺,而是因为自身的相似处境得到理解,悲伤与不堪才得以释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有言“怀有同理心的想象没有边界”,好比鲁迅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当人们愿意去理解、想象动物和他人的痛苦,进而付出关怀之时,即便没能在当下带来立时的变化,却已经为扭转现实做了努力。《另一次是遇见你》不是惨淡而令人沮丧的故事,不是生命的消歇,而是相遇。